

◆
一、
综述
◆

红山文化研究回顾

红山文化从 20 世纪初发现以来，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因长期被作为受中原仰韶文化影响的边远地区文化对待，红山文化在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中并未得到应有地位，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东山嘴，牛河梁坛、庙、冢遗址和玉器群的发现并导致中国文明起源的再讨论，才引起更多重视。所以，回顾红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史，可以 80 年代中期为界分为前、后两段，自然，后一段是红山文化研究史的重点。

一、红山文化的发现、定名与初步认识

红山文化的最初发现，以赤峰红山后与锦西沙锅屯两处遗址为重要。

红山后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北郊英金河畔。1908 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在原热河省调查时，曾到这一区域采集文物，并注意到红山周围在先史时代的重要性^①；从 1919 年起，法国神父桑志华（E. Licent）也多次到原热河省调查，1924 年他与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T. de Chardin）在红山前遗址采集到细石器、石犁耜等^②。

不过，最初使世人较多认识红山文化这类遗存的，是较早正式发掘和发表材料的辽宁省锦西县（今葫芦岛市）沙锅屯洞穴遗址^③。1921 年 6 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在辽西进行煤矿调查时发现这处遗址，当即进行发掘。洞内堆积可分为 5 层，采掘文物主要属于新石器时代，计有石刀、细石器、石环、石兽形饰、骨锥、骨针、饰压印“之”字纹和饰绳纹的夹砂灰陶筒形罐、彩陶折腹盖盆、红陶双耳壶等，还出有代表 42 个个体的人骨，报告推测这个洞穴非古人居住地，而是一处祭祀址。50 年代初，因分析出该遗址出土的鬲形陶器时代较晚，进而对早年发掘时地层划分的科学性提出疑问，这处遗址一度被冷落^④。近年，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作了重新调查，发现这处洞穴遗址位于远离河川的山坡高处，确非古人居住地。同时在沙锅屯以西 30 公里处的喀左县境内，发现一处时代和文化内涵与沙锅屯相同的洞穴遗址。洞穴位置在接近山峰顶部的陡直山坡上，较沙锅屯洞穴所处位置更高，也更为险要。出土物为与沙锅屯遗址相同的饰绳纹夹砂灰陶直腹罐、泥质红陶双耳罐、彩陶盖盆等，且也有多具完整人骨。据此，我们以为，沙锅屯洞穴遗址应以墓葬

① 鸟居龙藏：《蒙古旅行》，1911 年；《东蒙的原始居民》（法文），1914 年。

② E. Licent, Les collections néolithiques du Musée Hoangho Paiha de Tientsin, Publication du Musée Hoangho Paiho de Tientsin, No.14, 1932.

③ 安特生：《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层》，《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一册，地质调查所，1923 年。

④ 安志敏：《沙锅屯洞穴层位之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第 154—162 页，文物出版社，1992 年。

为主,兼具祭祀性质,所出遗物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时期,也有属于红山文化的遗物。安特生是在发掘完沙锅屯遗址之后转而南下,于同年10月发掘著名的河南省浞池县仰韶村遗址的。这样,沙锅屯遗址就成为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史上第一次经正式发掘的遗址,也是赤峰红山后遗址发掘之前认识红山文化这类文化遗存的主要资料。

中国学者较早注意到长城以北地区发现的这类彩陶文化遗存的重要性并着手开展田野工作,这方面首推梁思永。1930年冬,梁思永在完成黑龙江的工作后,转道当时的热河省进行考古调查,几乎穿越该省全境,即由今内蒙古东南部的通辽、开鲁到赤峰地区的天山、林东、林西、克什克腾旗、赤峰,转河北围场、承德返北京。梁先生这次热河之行,本来是想作一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但因天气骤冷等原因,改为调查。除在克什克腾旗陈家营子采集到一种“很像没有绘彩的仰韶陶片”可能与红山文化有关以外,还在赤峰城东到红山嘴之间的北沙窝和东沙窝进行调查,并与桑志华所著《天津北疆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时代遗物》图版中所见赤峰采集陶器相比较,认为“尤可注意的是仰韶式的彩陶”。据梁先生1935年有关调查报告补记,他的这次包括热河考古在内的东北考古之行,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1930年发动的“东北考古”计划的一部分,寻找与长城以南彩陶文化有关的南北接触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应当是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之一,但这一计划因为东北被日本军队侵占而搁置^①。

紧接着,追随日本军队之后,1933年以德永重康为首的“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研究团”成员八幡一郎在红山前调查,并在红山后发掘青铜时代石棺墓^②。两年后的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对红山后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1938年发表正式报告书^③。调查和发掘本以青铜时代石棺墓为主(报告称为第二期文化),调查期间在红山山后(北侧东坡)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报告称为第一期文化),遂进行发掘,出土有大量打制、磨制石器、细石器、完整和可复原的陶器以及蚌、贝、骨、角、牙器,还发掘到灶址。报告注意到与彩陶共出有具北方特色的压印纹夹砂灰陶。这次发掘,由于资料较为丰富,且报告发表详细,遂成为此后认识红山文化的主要资料。但因发掘点分散,仍旧缺少对遗址全貌的了解。

中国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发现初期作了较多研究。代表人物是梁思永、裴文中和尹达。

早在1930年发表西阴村考古发掘报告时,梁思永就十分注意长城以北的有关材料,除比较出与西阴村遗址的差异以外,又特别注意长城南、北两地的接触,为此,他提醒学界注意“沿边文化接触区域”^④。

此后,裴文中对长城以北这类含彩陶的文化遗存及其所反映的南北关系作了更为明确的论述,认为长城附近是彩陶文化与细石器文化混合地带,并设想了细石器文化由北而南,与南来的彩陶文

① 梁思永:《热河查不干庙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1935年,《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第144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② 八幡一郎:《热河省北部ノ先史遗迹及遗物》,《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研究团报告》第六部第三编,1940年。

③ 滨田耕作、水野清一:《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一》,《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六册,东亚考古学会,1938年。

④ 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1930年,《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第1—49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化相遇的移动路线。不过,裴氏以为这种集南、北两类文化内涵的“混合文化”,成分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仍属于北方地区的细石器文化^①。

由于中国考古界对这一文化的重视,新中国考古工作刚一起步,就开始了对红山文化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使红山文化从50年代到70年代,都有新的研究成果。

20世纪50年代红山文化的主要研究成果,一是确定了对红山文化的定名,一是恢复了对红山后遗址的发掘。在梁思永的建议下,尹达在他的专著《中国新石器时代》中,专门列出一章分析红山后遗址的章节,认为红山文化是南、北文化接触后产生的一种新文化,并建议称为“红山文化”^②;1956年,吕遵谔率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在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了实习发掘,在进一步明确文化性质的基础上第一次正式使用了“红山文化”这一名称^③。

20世纪60年代与红山文化有关的工作有赤峰地区细石器文化的调查、富河沟门遗址的发掘和富河文化的定名^④。并针对这类遗存普遍缺少原生地层的情况,提出在“细石器文化”中划分不同考古文化的研究方法,把红山文化作为广义的北方细石器文化的一种类型^⑤,以后又以这种方法对红山文化及有关文化作具体比较,从而增强了对红山文化自身特征及有关文化关系的认识^⑥。

20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有红山文化新材料的发表和新的发现。蜘蛛山发现有红山文化层上依次迭压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战国燕、秦文化的地层关系^⑦,西水泉遗址发现有房址^⑧,蜘蛛山、西水泉和三道湾子出土有成组合的陶器,四棱山遗址更发现了陶窑群^⑨,这就不仅使红山文化的材料趋向全面,更得到原生地层、遗迹和器物群方面确切的共存关系,有可能在可靠的层位学基础上对红山文化的特征、分期类型等进行研究,并形成70年代前后对红山文化的基本认识^⑩。

红山文化拥有发达的石器群。打制、磨制石器和细石器三种石器类型共存,以石犁耜为代表的大型石器较多,弧刃横断面呈椭圆形石斧、桂叶形石刀也很具特色。反映农牧渔猎并重的经济生活。遗址中多见鹿类和野性较强的猪骨等也可相互印证。

陶器中具长城以北地区特征的夹砂灰褐陶和具中原仰韶文化特征的泥质红陶共出,前者以饰压印“之”字纹筒形罐为主,后者以盆、钵、罐、瓮为主,并有彩陶。彩陶图案以具自身特征的龙鳞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简化玫瑰花纹和具有西部特点的几何纹为主,还出有少量质软而制作精细

① 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8年。

② 尹达:《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新石器时代》第143—14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③ 吕遵谔:《内蒙赤峰红山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④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组:《昭乌达盟巴林左旗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37页,文物出版社,1961年。

⑥ 刘观民、徐光冀:《辽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第72—79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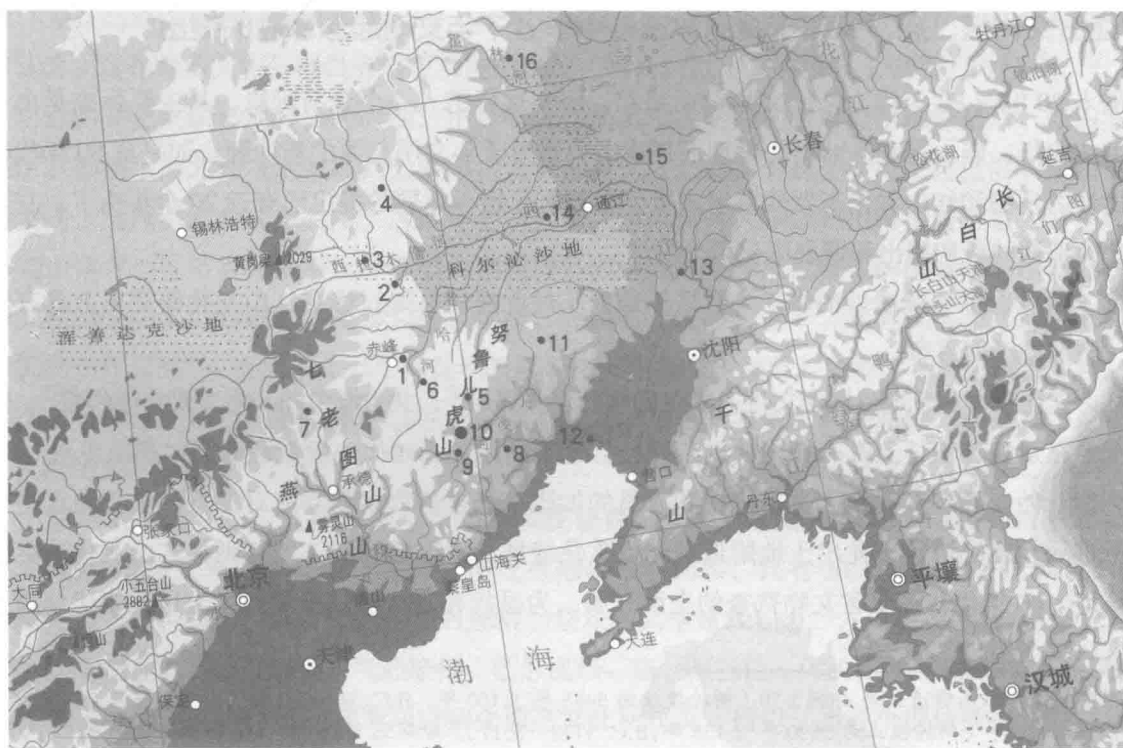
⑨ 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敖汉旗文化馆:《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掘》,《文物》1977年第12期。

⑩ 郭大顺、马沙:《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诸问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172—17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的泥质磨光黑陶，是红山文化制陶业出现的新因素。

关于红山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址。这方面的资料较少。主要在英金河两岸长达 150 公里范围内调查过 18 处红山文化遗址，它们所处的位置在高出河床 10 米—40 米之间，多在南坡和东坡，文化堆积 0.5 米—2 米。红山文化的房址主要在赤峰西水泉遗址被发现，其特点为方形半地穴，顺山坡建筑，居住面夯打，中央有瓢形灶址，房门朝南，有斜坡状门道，房址一般边长在 4 米左右，最大的一座房址每边长达 10 米，房址内大都出有成套的生产和生活用具。

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东越过医巫闾山，但未过下辽河，南界东段达渤海沿岸，西段越燕山山脉到达华北平原北部，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发现了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相遇的现象，这里可视为红山文化分布的西界，唯向北分布甚广，不仅越过西拉木伦河，而且有继续向蒙古草原深入的趋势，值得注意。从分布密度和文化面貌的典型程度看，以老哈河中上游到大凌河中上游之间最为集中，这两河流域应是红山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图一）。



图一 红山文化重要遗址分布图

1. 赤峰红山后 2. 翁牛特旗三星他拉 3. 巴林右旗那斯台 4. 巴林左旗尖山子 5. 敖汉旗四家子 6. 建平五十家子
7. 围场下伙房 8. 葫芦岛市南票沙锅屯 9. 喀左东山嘴 10. 牛河梁 11. 阜新胡头沟 12. 盘锦市郊 13. 康平县郊
14. 通辽坤都岭 15. 科左中旗新艾力 16. 科右中旗嘎查营子

红山文化的年代与分期，一般分为与仰韶文化大体对应的两大期，早期相当于后岗一期文化，晚期与庙底沟类型相近， ^{14}C 测定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几个数据均在距今 5500—5000 年间，可以相

互对照^①。

除此而外，这一时期关于红山文化讨论较多的是对红山文化性质的分析，围绕着对该文化所含南、北文化成分而有不同理解。除前述把红山文化作为南、北接触后产生的混合文化和新文化以外，有认为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系统的原始文化^②，也有认为是仰韶文化的地方性变体或认为红山文化是继承了河北的磁山文化^③。随着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建立，特别是查海、兴隆洼等先红山文化和小河沿、大南沟等后红山文化的发现和确认^④，多倾向于认为红山文化是当地自行发展的一种新石器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⑤。

不过，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红山文化的工作缺少大规模发掘和成批资料的积累，研究工作也受到很大局限。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这一时期新石器文化研究进展较快的形势相比，显得平静。然而，红山文化具有南、北两种文化双重特征仍在有识者的脑海里萦绕，它可能有更深的历史背景。

二、红山文化坛、庙、冢和玉器的发现与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课题的提出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红山文化异军突起，研究过程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其主要标志是由于辽西红山文化坛、庙、冢和玉器群的发现而提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新课题。如果从 80 年代初东山嘴遗址的发掘和红山文化玉器的鉴定成果公布算起，这一课题的提出已有近 20 个年头了，它们也可以分为课题的最初提出和课题深化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为重要标志，不过此前的酝酿过程在红山文化研究史上具有转折意义，主要做了四件事。

红山文化玉器的考定。红山文化玉器在 30 年代已见著录^⑥，并为海内外一些大博物馆收藏^⑦，由于这批玉器在造型和工艺上都有相当的进步性，且近于商周玉，时代一般定在商周时期或更晚。从 70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有关地区文物机构和人员的加强，从玉器收集的当地对玉器的出土地点进行寻求有所进展。赛沁塔拉玉龙出土地附近有红山文化遗址，阜新胡头沟玉器墓则与红山文化遗存出于同一墓地。80 年代初辽宁省文物普查的全面开展，为寻找和确认这批玉器的出土地和年代创造了更

① ¹⁴C 测定数据：东山嘴遗址为 4895 ± 70 （树轮校正为 5485 ± 100 年，B.C. 3640—3382）；牛河梁牛 2Z1 积石冢为 4995 ± 110 年（树轮校正为 5600 ± 135 年，B.C. 3779—3517），分别见《文物》1984 年第 4 期第 94 页；《考古》1986 年第 7 期第 657 页。

② 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敖汉旗文化馆：《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掘》，《文物》1977 年第 12 期。

③ 安志敏：《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1981 年第 3 期；安志敏：《裴李岗、磁山和仰韶——试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渊源与发展》，《考古》1979 年第 4 期。

④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 1987—1990 年三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 11 期，又见《辽海文物学刊》1988 年第 1 期、1991 年第 1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 年第 10 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编：《大南沟——后红山文化的一种类型》，科学出版社，1998 年。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 175 页，文物出版社，1985 年。

⑥ 黄濬：《古玉图录初集》，1939 年。

⑦ 邓淑苹：《谈谈红山系玉器》，（台）《故宫文物月刊》第 189 期，1998 年。

为有利的条件。在东山嘴和三官甸子红山文化遗址都发现有玉器^①。但因墓葬的积石结构使地层的判断受到局限,有关墓葬又大都不出陶器,使最初的确认主要是从玉器自身的类型学和工艺学两方面进行的。并在玉器时代初步考定的情况下,以玉雕龙的出现为主要依据,提出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流域在五千年前出现原始文明的观点^②。

20世纪80年代初辽西地区的文物普查。这本是红山文化发现和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却成为推动红山文化进入新阶段的主要原因。因为在这次普查前,红山文化遗址在赤峰地区所知较多,也不过几十处,在辽宁西部地区,掌握的确切材料不超过5处。而在这次普查中共发现红山文化遗址600余处,仅敖汉旗就发现502处,为了解红山文化时期聚落形态提供了珍贵资料^③。尤其是东山嘴、牛河梁这两处遗址,都是在这次普查中发现的。

在这次普查的后期,对东山嘴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是在辽宁省境内对红山文化遗址进行的第一次正式发掘,收获却出人意料。因为这处遗址与一般居住遗址有很大差异。遗址坐落在大凌河畔高岗上,为石砌建筑群址,南为圆形坛式,北为方形基址。出有陶塑人像、玉器和一批非实用陶器,初步认为,这是红山文化一处具有祭祀功能的遗址,从而为红山文化增添了崭新的内容^④。

对红山文化认识出现转折的时期,正是考古界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前后。红山文化分布区所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被列为中国六大考古文化区之首,于是,红山文化玉器和东山嘴遗址等新发现,迅速引起考古界关注。1983年七八月间,苏秉琦等人亲临东山嘴遗址考察,并在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地区考古座谈会上,把国内发现最早的这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遗址与燕山南北地区在中华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和重要地位联系起来,并提出在凌源、建平、喀左三县交界地区开展调查和发掘的工作思路^⑤。会后不久,牛河梁积石冢、玉雕龙等玉器和更为重要的女神庙就接二连三地被发现了。可见这一课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也不只是一项重大发现所能引起的,而是在理论指导下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西部朝阳市建平和凌源两县交界处,是努鲁儿虎山谷间由东北到西南走向蔓延达10余公里的多道黄土山梁,遗址点都分布在岗顶,共有20多个地点,已编号16个地点。除女神庙外,还有围绕女神庙的积石冢群、祭坛和其他建筑基址,占地在50平方公里上下(图二)^⑥。这个遗址群,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已形成坛、庙、冢三位一体的完整而规律的组合,出土女神塑像和玉器规格甚高,这些都为同时期史前诸文化所仅见。所以,当这个遗址的初步发掘成果以

① 翁牛特旗文化馆:《翁牛特旗出土红山文化玉龙》,《文物》1984年第6期;方殿春、刘葆华:《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文物》1984年第6期;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李恭笃:《辽宁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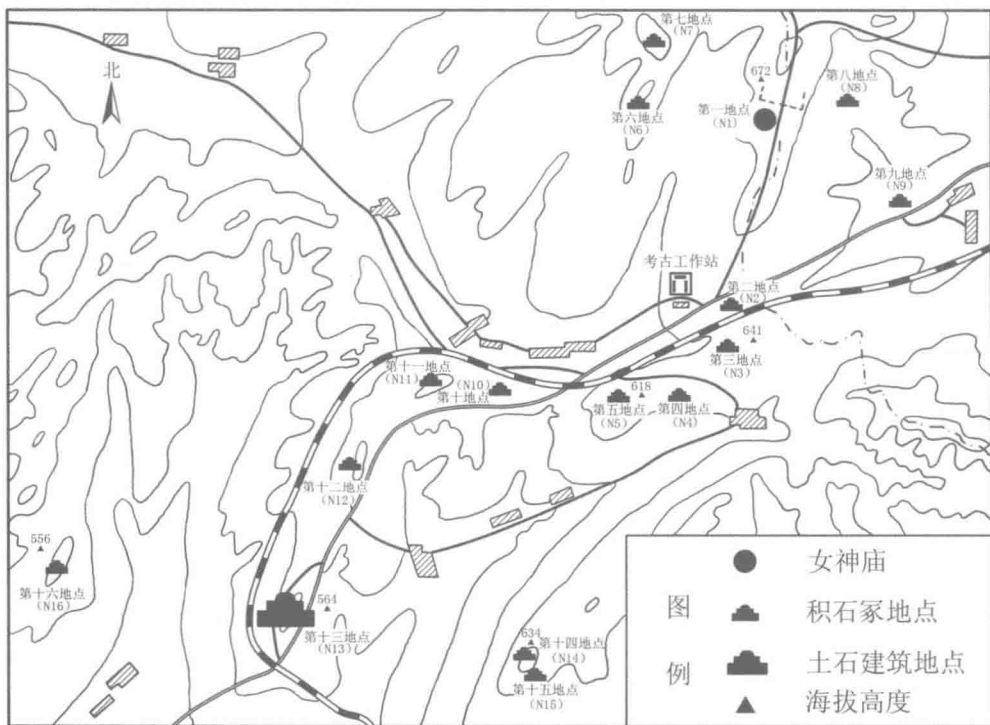
② 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6期。

③ 邵国田:《概述敖汉旗的红山文化遗址分布》,《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97—10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④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⑤ 苏秉琦:《燕山南北地区考古——1983年7月在辽宁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物》1983年第12期;俞伟超、严文明等:《座谈东山嘴遗址》,《文物》1984年第11期;《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纪要》,《文物》1983年第12期。

⑥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图二 牛河梁遗址点分布图

“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为题报道后，立即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大讨论^①。

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和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这一课题提出的学术意义在于：它将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从距今 4000 年前的夏代一下子提前了 1000 多年；从中原地区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文明起源的标准也不再局限于文字、城市和金属的所谓“三要素”说。由此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如对大地湾仰韶文化后期遗址大型多间“殿堂”式房址^②、良渚文化的土墩墓玉敛葬^③、山西省陶寺遗址出庙堂陶、石礼乐器的大墓^④，也都认为应是文明起源的征兆，这固然反映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同时也说明从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这一课题已经成熟。

一时，对红山文化研究的力度明显加大。分期类型研究有新成果，如将红山文化分为三期，将老哈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划分为两个支系^⑤。不过，有关研究主要是围绕文明起源这一课题展开的。海外也加强了这方面的介绍和研究，重点在玉器^⑥。

① 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人民日报》海外版 1986 年 8 月 4 日，《东南文化》，1988 年第 5 期转载修改稿；孙守道、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人民画报》1986 年第 8 期。

② 《甘肃出土五千年前殿堂遗址》，《光明日报》1986 年 8 月 7 日第一版。

③ 汪遵国：《良渚文化“玉敛葬”略述》，《文物》1985 年第 2 期。

④ 高炜：《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第 56—68 页，文物出版社，1989 年。

⑤ 杨虎：《关于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 216—226 页，文物出版社，1989 年；张星德：《红山文化分期初探》，《考古》1991 年第 8 期。

⑥ 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邓淑萍编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 年；杨建芳：《红山文化玉器——前所未知的中国史前玉器》，《中国文物世界》1985 年 10 号；秋山进午：《红山文化与先红山文化——赤峰红山考古、其一》，《古史春秋》第五号，朋友书店，1989 年；Elizabeth Childs-johnson：《Jades of the Hongshan culture: the dragon and fertility cult worship》，Arts Asiatiques extrait Tome XLVI—1991。

红山文化是否已进入文明时代,对此尚有各种不同意见。有坚持中原中心说,反对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并以金属铜的发明、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形成这“三要素”为标准,不同意红山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①;多数学者渐倾向于中国文明起源多中心论,认为红山文化即使未进入文明时代,也已具备了若干文明因素^②。同时,在讨论中多数学者已注意到史前礼制的形成是文明起源重要标志和特点,并以此分析红山文化的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和玉礼器的形成,从而注意到燕山南北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性。所以,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思考问题的方法和方向趋于一致,这十分有利于研究的深入。红山文化的研究及由此引发的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也因此而并未停步,而是在讨论中不断深入。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是红山文化研究的深化阶段。由于苏秉琦先生在文明起源讨论向纵深发展时关于古文化、古城、古国和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的系统论述中,把红山文化作为古国阶段的一个典型例证^③,所以这一时期红山文化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五千年古国”这一命题展开的,且与同一时期文明起源讨论的进程几乎是同步的。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特定含义的城和镇,古国指基于公社又高于公社的政治实体。根据近年的发现和认识,我们以为,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群是古国概念的一种模式。因为牛河梁遗址虽然还大量保留着原始氏族公社的成分,但已脱颖而出,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这在红山文化积石冢、女神庙和遗址布局上都已反映出来。

就红山文化积石冢而言,分布在诸山岗岗顶的积石冢群,或一岗一冢、一岗双冢和一岗多冢,冢内有成行排列的墓葬,尚具氏族公共墓地的一些特征。不过,如与同时期前后诸史前文化的墓葬相比,除积石成墓与通常所见以土坑墓为主的结构有明显差别以外,最大的不同处在于,红山文化积石冢单元分化明确,每个岗冢是大单元,岗冢上的每个积石冢是大单元下的小单元,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并同部落、氏族、家族相对应^④。其实这种已有很明确的界限并具有严格的层次性的埋葬形式,已超越了以血缘纽带维系的氏族公共墓地,而表现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设有中心大墓。已发掘的几座中心大墓,不仅在该岗诸冢墓中规模最大,随葬玉器最多最精,而且墓壁都起2—3层台阶,这种中国古代表示墓葬高规格的台阶制度,在史前文化墓葬中是十分罕见的。这类中心大墓,在每个岗冢中只在一个冢中出现,这个冢位置往往在岗顶正中,是为该冢群的主冢,主冢内其他墓葬与中心大墓的主附关系,主冢与同一岗冢的其他冢的主次关系,一目了然。红山文化积石冢所表现的这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与同时期前后诸史前文化所见墓葬分化,如良渚文化人工堆筑土墩上的大墓成群和大汶口文化墓群中大小墓之间的分化相比,更加突显了中心大墓主人“一人独尊”的身份地位。这一座座积石冢,置于岗

① 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

② 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③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④ 尚晓波:《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存墓葬习俗初探》,《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第110—113页,知识出版社,1993年。

峰之巅，又层层迭起，已是后世“山陵”的景观，或称为“陵区”^①、贵族墓地或近似于“王墓”^②。中心大墓主人已具王者身份应没有多大疑问。

根据阜新胡头沟、敖汉四家子以至林西白音长汗等地发现的红山文化积石冢看，牛河梁遗址积石冢所表现的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化，具有一定普遍性，说明这种等级分化已经制度化，而且这种等级制在牛河梁女神庙也有相对应的表现。

由于发掘技术条件尚在准备之中，女神庙这几年并未进行正式发掘。不过，前几年初步试掘的情况已显示，牛河梁女神庙作为更高层次的祭祖场所，在表现社会结构方面较积石冢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更为复杂和深层次的一面。女神庙虽然也保留了一些原始和过渡的特征，如原始居住址所普遍采用的半地穴式和多室又连为一体的结构布局，但庙的复杂的多室结构，主次分明，左右对称，前后呼应，其规模和等级已远非史前期一般居住址的单间、双间甚至多间房屋所能比拟，庙内供奉的神像已发现分别相当于真人的原大、真人2倍和3倍，似是依次递增的三个等级，尤其是相当于真人3倍的女神像残件，位于主室中心，可能已有一尊主神，是围绕主神的群神崇拜。如果这一推测在今后发掘中被证实，那么就可以说明人世间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分化，已经被宗教形式固定下来，这当然是礼制走向成熟的表现。

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女神庙作为先祖偶像所居之所，总面积不到100平方米，最窄处仅2米，以如此窄小的空间容纳以大型神像群为主、包括动物神在内的丰富而庞大的内容，曾使人对它的功能产生怀疑。其实，这显示原始宗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封闭性、神秘性，在使用上也具有很强的专一性。因为在这样窄小的空间内活动的只能是极少数人，也就是说，能够有资格进入庙内进行祭祖礼仪、与先祖直接沟通的，只能是极少数特权人物、甚至只能是“一人”的事，这应是“一人独尊”和神权垄断的又一典型例证。

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形成。在史前诸文化中，聚落的分化主要表现为一般聚落和中心聚落的区别，而最高层次的中心聚落的出现意味着社会结构已经发生质变。古文化、古城、古国作为区系类型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心环节，在于提高田野工作中寻找中心聚落、特别是寻找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意识，即“都”与“野”之别。这同聚落考古中聚落层次性研究是一致的。凡从聚落考古的角度研究红山文化，都已注意到牛河梁遗址所具有的中心聚落的特殊地位，以为是红山文化相当大的部分地区居民的聚集处或整个红山文化举行祭祀礼仪的公共活动中心^③。其实，牛河梁遗址就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中心聚落。这除了遗址群规模宏大，单体遗迹和出土器物都规格甚高以外，主要还表现为，遗址群分布范围虽十分广阔，地势又多有变化，却能顺山势，定方向，按高低上下进行规划布置，使诸多建筑按南北轴线严格布局，主次分明，相互联系，彼此照应，将大范围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巧妙结合起来，将人文景观融于大自然之中。对于这样一个大规模祭祀礼仪性建筑群体，苏

① 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1期。

② 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中国王墓的出现》，《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

③ 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第4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杨虎：《关于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214—226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刘晋祥、董新林：《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史前聚落形态的初步研究》，《文物》1997年第8期。

秉琦先生早在牛河梁遗址刚发现时,就曾将它们与古代帝王举行的“郊”、“燎”、“禘”等祭祀活动相联系,值得深思^①。显然,这样一个高等级的祭祀遗址群,已远非一个氏族或部落所能拥有,而只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对共同先祖进行崇拜的圣地,牛河梁遗址群又正好坐落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内四通八达的中心部位,它四周的赤峰、敖汉、阜新、承德等地区已发现的积石冢,从所处地势、冢的结构以及随葬玉器的种类、造型上分析,都与牛河梁遗址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②,反映出最高层次中心聚落对周围地区所具有的控制力和凝聚力。所以,红山文化已达到形成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水平,这是跨进古国阶段的又一重要标志。

重视文化交汇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推动作用。

红山文化时期正是各地古文化个性充分发展时期,也是诸文化频繁交汇时期。红山文化的文化交汇包括区内和区间两个方面。

区内即“红山诸文化”间的关系。“红山诸文化”,是红山文化时期区内诸文化共存及关系的准确表达。它既包括红山文化的来源和去向的先红山文化(查海—兴隆洼文化)和后红山文化,也包括区内与红山文化共存的诸文化。目前可以确定的与红山文化在当地有大致并行发展关系的主要为赵宝沟文化和富河文化。关于赵宝沟文化,有人以为其年代要早于红山文化^③,也有人以为与红山文化早期有一段平行关系^④。无论如何,该文化具有的以“四灵”纹陶尊为代表的超发展水平,对红山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曾起过促进作用;富河文化的年代,过去依¹⁴C测定数据和地层关系,认为它晚于红山文化,现据本身文化特点的分析及同先红山文化的比较,多倾向于其年代可与红山文化平行^⑤,经济类型以狩猎畜牧为主,从而成为区内与红山文化交错共存、相互促进,对红山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又一支史前文化。

不过,对红山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南北区间文化的交汇,这主要指的是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关系。红山文化发现之初已注意到该文化所具有的南、北两种文化的双重特征。就在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群发现前夕,河北省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上游的壶流河流域发现了红山文化晚期彩陶器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的共生现象^⑥,由此就看到了这一文化交汇的路线、过程、对接点和后果。对此,苏秉琦以为:“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形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刻划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

① 苏秉琦:《笔谈东山嘴遗址——我的一点补充意见》,《文物》1984年第11期。

② 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7期。

③ 杨虎:《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与分期》,《文物》1994年第5期。

④ 刘晋祥:《赵宝沟文化初论》,《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198—202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⑤ 郭大顺、马沙:《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诸问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朱延平:《富河文化的若干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14—11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⑥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张家口考古队:《一九七九年蔚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1981年第2期。

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和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这是两种经济类型和两种文化组合而成的文化群体。这个群体的活动中心范围既不在北方草原的牧区，又远离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关中盆地，而是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老哈河上游宜农宜牧的交错地带。这里自然条件的优势，大概正如古文献关于九州第一州冀州记载的所谓‘赋上上错，田中中错’，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土质肥沃，而是多种经济补充造成的繁荣昌盛，才得以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北京天坛的圜丘，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庙的彩塑神像眼球使用玉石质镶嵌与我国传统彩塑技法一致，冢的结构与后世帝王陵墓相似；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转折，他们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①。

可见，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结合，尽管是两种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结合，却不是文化间的替代，不是简单的复合体，也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将具仰韶文化特征的因素与当地文化因素融为一体，成为红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无疑，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结合。“当仰韶与红山一旦进一步结合起来，中国文化史面貌为之一新”^②，成为五千年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也是红山文化率先跨入古国时代的动力之一。

三、红山文化研究的新课题

随着红山文化研究的深入，新的课题不断提出，他们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展开的。

1. 加强基础工作

红山文化的研究虽已进入到探索社会发展阶段的深层次阶段，基础工作却较为薄弱，迫切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是：分期与地方类型的划分问题；寻找与牛河梁遗址相适应的居住遗址问题。

关于红山文化的分期与地方类型的划分。有关的分期因注意了共存关系和同类器物的比较，取得一定成果，但由于缺少对某一个具体遗址全面系统解剖的资料，比较也显零散。同时，有关分期都是将赤峰地区发现的居住址与东山嘴、牛河梁的祭祀性遗址这两类不同性质遗存的不同功能的陶器相比较，所以最后结论都有待进一步验证。可喜的是，随着对红山文化遗址大面积的揭露，这方面的情况正在改变。新近牛河梁积石冢的发掘在分期上就取得重要进展（图三）。牛河梁第二地点第四号冢为上下有叠压关系的两层墓葬，在积石冢结构和陶器上也有相应的变化；牛河梁其他地点也发现了与第二地点第四号冢相应的地层关系和陶器变化。这一建立在解剖一个具体单元的分析，对于最终解决红山文化的分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虽然由于牛河梁遗址的特殊功能，该遗址的分期有一些特殊性，但仍是红山文化分期的一个突破^③。

至于与牛河梁遗址相对应的居住遗址的寻找，应充分考虑红山文化的特殊性。目前，在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女神庙北的大型山台上，已有新的遗迹现象露头，敖汉西台遗址发现聚落环壕和铸铜

① 苏秉琦：《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辽宁画报》1987年第1期。

② 苏秉琦：《纪念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六十五年（代序言）》，《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特辑》，1986年。

③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四号冢筒形器墓的发掘》，《文物》1997年第8期。

陶合范^①,都是不应忽视的线索。

与此有关的基础工作还可提出玉器的研究。已在红山文化玉器的区域性特征、玉器分类与造型、功能及其社会思想观念上的意义等方面多有讨论^②,甚至重提中国上古史上的“玉兵时代”(或“玉器时代”)^③,但有关红山文化玉器自身的分期及分区,玉料的产地和玉作坊的探寻,玉器工艺等仍是薄弱环节,亟待加强。

2. 围绕红山文化社会发展机制提出的其他研究课题

关于红山文化的性质。曾较多注意红山文化农耕的发展,将红山文化划归黄河流域的燕辽文化区^④。近年,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指导下,多将中国史前文化中经常起作用的古文化分为三大区:以钵、盆、鬲为主要特征的中原粟作农业文化区,以鼎为主要特征的东南沿海稻作农业文化区和以筒形罐为主要特征的东北渔猎文化区^⑤。红山文化所在的西辽河流域,在距今7000年前后的查海—兴隆洼文化时期,是阔叶林和针叶林混交型的森林草原地区,到距今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气候虽有向暖湿转化的过程,遗址海拔高程相应下移,发展了农业,但从红山文化遗址出土较多野生动物骨骼,如熊,赤鹿,马鹿,具有较多野生特征的猪、羊等,以及细石器和打制石器较发达,居住遗址文化堆积普遍较薄所反映的定居不稳定性等方面看,仍属森林草原地区文化,采集、渔猎在经济生活中仍举足轻重。与红山文化在西辽河流域北部交错分布同时共存的富河文化遗址,多见沙漠草原型的野生动物鹿、猪、獾等,也可供参照^⑥。尤其是红山文化以筒形陶罐和细石器为主要文化特征,这是东北地区以至东北亚地区普遍的文化特征,所以,红山文化是以东北渔猎文化为本的一支史前文化。

不过,红山文化所在的辽西地区,又是东北渔猎区与中原农耕区交汇的前沿地带,如果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的结合,是东北渔猎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结合,那么对渔猎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就应重新估价^⑦。这方面的深入研究,需要对红山文化开展多学科协作,进行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方面的基础工作。

① 杨虎:《敖汉旗西台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第134—135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② 黄宣佩:《略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海博物馆集刊》第150—170页,1987年第4期;陆思贤:《勾云形玉佩的形状结构及寓意的思想内容》,《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第24—32页,海洋出版社,1991年;邓淑苹:《龙兮?凤兮?——由两件新公布的红山玉器谈起》,(台)《故宫文物月刊》第114期,1992年;杨美莉:《卷云山麒麟 翠石水磷磷——新石器时代北方系环形玉器系列之一——勾云形器》,(台)《故宫文物月刊》第126期,1993年;郭大顺:《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研究——辽河文明巡礼之四》,(台)《故宫文物月刊》第164期,1996年。

③ 孙守道:《论中国史上“玉兵时代”的提出——红山文化玉器研究札记》,《辽宁文物》1983年第5期;牟永抗、吴汝祚:《试论玉器时代——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考古学文化论集》第164—187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④ 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第1—17页,《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⑤ 秋山进午:《东北地区の新石器文化》,《世界の大遗迹·9·古代中国の遗产》,讲谈社,1988年;甲元真之:《长江と黄河——中国初期农耕文化の比较研究》,《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报告》40集,1992年;严文明:《中国古代文化三系统说(提要)》,《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⑥ 孔昭宸、杜乃秋、刘观民、杨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距今8000—2000年间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葬发掘报告》附录二,第323—333页,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⑦ 张忠培:《黑龙江考古学的几个问题的讨论——1996年8月24日在“渤海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郭大顺:《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北方文物》1996年第4期。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道路和特点。张光直依据商代青铜器及其纹饰的分析和文献记载相结合，提出中国文明起源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和道路，西方是以发展技术、贸易，改造自然的“破裂性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是以人与神沟通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连续性文明”^①。在这方面，红山文化只葬玉器，少葬或不葬陶石器的“唯玉为葬”的葬俗是很典型的例证。因为玉器是一种以其自然特性达到通神目的的非实用性礼器，是在表达一种精神重于物质的思维观念，唯玉为礼才是“礼”的初意，这同释“礼”字为“以玉事神”不谋而合^②，这既是辽河流域文明起源的特征，也反映了中国文明起源走过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道路，这方面如作进一步探讨，必将大大加深对中国文明起源道路和特点的认识。

此外，与古史传说的结合，与世界古文明的比较等课题，也已提上日程。

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在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同时，也多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相联系。据研究，五帝时代可分为前、后期，以黄帝为代表的前期，多有在燕山地区活动的记载，红山文化的发现，可能证明了这些记载的可信性^③。

与世界古文明的比较。由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提出，为同世界诸文明古国的比较创造了条件。这是一个研究范畴更为广阔的课题，需要对国外（包括中间环节、中间地带）有关资料的深入了解和消化，但这方面已有的线索，如积石冢与金字塔演变的阶段相似性和文明初始阶段突现一人独尊的共同观念；女神塑像的发达及共同性；喜用石头建筑等，这些共同点和相近点，既有共同的时代特征，也不应排除相互交流和影响，这方面的前景十分可观。

（原载于严文明主编《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新石器时代考古卷》第235—258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①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第131页，《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一辑，第290页，中华书局，1959年；郭大顺：《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再认识》，《文物》1997年第8期。

③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第104—113、130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陈平：《略论阪泉、涿鹿大战前后黄帝族的来龙去脉》，《北京文博》1998年第4期。

从东山嘴到牛河梁

——辽西红山文化遗址发现始末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辽西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因提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新课题而闻名海内外，不过，这一重大考古发现最初却是从一个僻静的小山村开始的，这就是发现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喀左县东山嘴村。

一、大不寻常的东山嘴遗址

那是 1979 年的春季，全省开展文物普查，我担任喀左县普查队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是我省文物埋藏比较丰富的一个县，仅窖藏的商周青铜器就出土过 60 余件，红山文化遗址却还只有一点线索，尚无正式登录的资料。于是我把寻找红山文化遗址列为普查的重点。那年在喀左县一共发现了 20 余处红山文化遗址，东山嘴遗址是其中之一。

东山嘴遗址位于喀左县城所在地的大城子镇东北约 2 公里、兴隆店乡东山嘴村北一个高敞的山冈上。南隔大凌河川正对马架子山的山口。遗址东西长约 60 米，南北宽约 40 米。没有晚期扰动，文化堆积十分单纯。当年的普查后期，省里安排选择几个遗址点作考古发掘，以使这次普查有一个

更完满的结果，自然，东山嘴遗址被选为发掘地点。

刚一动土就有新的发现，先是露出一段南北向的石砌墙体和出土了一批前所未见的陶器。石砌建筑遗迹经全面揭露，得知南部为一直径 2 米余的圆形祭坛，北部为每边约 10 米的方形建筑址，为前（南）圆后（北）方、东西对称、似以中轴线布局的一组建筑遗址（图一）；陶器中有内外绘彩的盖盆、圈足黑陶盘、类似于酒杯的三足杯，特别是没有底部的筒形器和塔形器。这些都预示着这处遗址并不寻常。



图一 东山嘴遗址鸟瞰（西北向东南）

接着出土的遗物更出人意料，一是玉器，一是陶塑人像。

玉器出土数量很少，体量也很小，完整的只有两件，但是这两件的造型都是前所未见的，一件是两端饰龙首的小玉璜，一件是绿松石质的玉鸟（图二）。在当时，这类动物形玉器，不仅红山文化未见过，就是当时全国已发掘的数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都从来没有发现过。特别是龙首形装饰，是从商代起在青铜器和玉器上才见到的。是地层出了问题吗？经检查，地层是清楚的，而且这个遗址的文化堆积又十分单纯。

不等我们将思路理顺，更大的意外发现又接踵而来，那就是陶塑人像。先是在遗址表土采集到一件人体的腰部，正面有仿皮条的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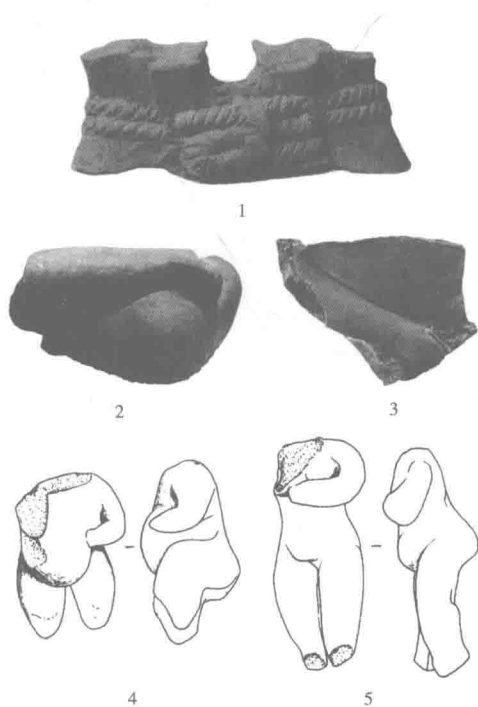


2

图二 东山嘴遗址玉器

1. 绿松石鸟形饰 (TC6 ②: 1)

2. 双龙首玉璜 (TE6 ② g1: 1)



图三 东山嘴遗址陶塑人像

1. 陶塑带饰的人体腰部 (TF10 ②: 1) 2. 陶塑人体下部

(盘腿式) (TD10 ②: 10) 3. 陶塑人体上部 (手握腕)

(TD10 ②: 9) 4、5. 东山嘴遗址陶塑小型孕妇像

(TD9 ②: 7, TD8 ②: 5)

带饰（图三·1）。接着出土的是两件体积大约相当于真人三分之一的陶塑，

一是人体的上部，左右臂交叉于腹部中间，左手攥拳，右手握左手手腕；另一件是同个体的人体下部，为盘腿正坐，右腿搭在左腿上，左足及足趾裸露。综观整体，塑造得虽然简练，却十分逼真（图三·2、3）。与此前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出工艺较为原始简陋的人塑像相比，完全是水平不在一个档次的两种风格。此后，又接连有不同个体的陶塑人像残块出土，其中较重要的，是两件小型孕妇塑像。这两件小型人体塑像，一高 5.8 厘米，一高 5.0 厘米。都为裸体倚坐式，腹部圆鼓，臀部肥大，是明确的孕妇形象（图三·4、5）。这类“妇女小雕像”，在国外的旧石器、新石器以至青铜时代遗址里经常出现，有的制作精良，被称为“早期维纳斯”，在中国，却还从未发现过，以至学界多已认为，中国上古时代人体雕塑并不发达。而这次在东山嘴这个小小的遗址里，一下子就出土了不同体量的多个人体塑像。

二、“等了三十年重大发现”

石砌建筑、特异形陶器、玉器，加上陶塑人像，这些在国内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没有或极少见到的遗存，却在辽西山区红山文化遗址反复出现，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时时站在遗址南部，瞭望隔大凌河开阔河川的大山山口，觉得此处遗址虽规模不大，但选址特殊，既有气势，又显神秘性，这完全不同于以往所知的新石器时代居住遗址，它的功能很可能与史前